王聪儿起义考叙

奚 原

清嘉庆元年，在湖北、四川、陕西边境大巴山脉周围地区，西连终南山脉一带，爆发了以白莲教徒为主体的农民抗清反霸起义。王聪儿、姚之富率领的襄阳义军，是这次起义的中坚。由此掀起了一场延续九年，波及鄂、川、豫、陕、甘五省的农民战争。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。

一

这次农民战争爆发于嘉庆元年，其根源却在乾隆年间。嘉庆即位之后，乾隆仍以“训政”名义和太上皇身份继续执掌军国重务三年，直到去世前夕。所以面对当时的纷乱局势，这位太上皇不能不承认：“兹政事有缺，皆朕之过，非皇帝之过。”①

乾隆帝统治后期陶醉于鼎盛的业绩，骄矜自满起来，喜爱阿谀逢迎，恶听忠言进谏，恩宠佞臣，讲求豪华，以致忽视人民疾苦，政务日趋腐败，加上人口繁增，天灾频仍，民不聊生，社会矛盾渐渐激化，许多地区相继陷入动荡。大清王朝转眼之间从盛世顶峰滑坡下来。

广大遭受劫难而幸存的人们，为寻求生路挣扎着。在汉水南北绵亘数千里的大巴山和终南山地区，崇山叠嶂，遍布原始老林，土地贫瘠，山洪暴泄，气候高寒，本是人迹罕至之境，此时却成为落难者的求生之地。据毕沅在《兴安升府疏》中说：自乾隆三十七、八年后，川、鄂、豫、赣等省贫民陆续来山区认地开荒，到四十七年，仅兴安（今安康）一州六县“流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”②。两大山区流入贫民总数难以确计，据乾隆末年官方估计约达数百万人，情景凄怆。《三省边防备览》有如下一段描述：

> “老林未开之先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，虎祸尤多……流民之入山者，扶老携幼，千百为群，到处络绎不绝。不由大路，不下客寓，夜在沿途之祠庙、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，取石支锅，拾柴做饭。遇有乡贯，便寄住舄地开垦，伐木支椽上覆茅草，仅蔽风雨……故统谓之棚民。”③

入山流民除充佣农外，还在山内木厂、纸厂、盐井、铁厂、煤厂、耳菌厂当佣工或背运工。贫困区的官吏、地主、厂主及高利贷者，尤为凶狠地压榨着落难的人们。如木材、盐包背运工，一次背负二百多斤，行走悬崖峭壁间，时有坠入山涧深谷者，而所得仅勉强果腹。可谓敲骨吸髓，暗无天日。

在这个悲惨世界里，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，渐渐蕴蓄着强烈的不满与反抗情绪。官府也感到这些深山老林是“五方杂处，良莠错居，风俗刁悍，匪徒出没”的危险奥区。④

伴随着清王朝的盛极而衰，民间宗教白莲教应时复活起来，并在大巴山、终南山及其周围各州县广泛传播和发展。

人们提出了“弥勒转世，保辅牛八”（“牛八”合为“朱”字，暗指明朝嫡裔）。⑤这个口号的出现，遂使白莲教具有了“反清复明”的政治色彩。

乾隆五十九年七月间，清廷从四川大宁县（今巫溪）和陕西安康县同时发现这一教案，逮捕了大宁教首谢天绣（清档案中因讳皆将“天”改为“添”，下同）等和安康教首萧贵等，随即跟踪严讯从教线索。八月间各地一批教首、教徒相继牵连被捕，襄阳地区宋之清、齐林等亦在其内。十月间全部遭到杀害，齐林等数十人被悬首示众于襄阳城门。

清廷历来称白莲教为“邪教”，严加取缔。自发现有“反清复明”迹象，认为显系“以布教为名，谋反是实”，当属“奸党”、“逆党”、“匪党”，急令“密查严办，根株尽绝，不留遗孽”，在鄂、川、陕边各州县展开了大搜查、大逮捕、大屠杀。腐败的地方官吏则乘机敲诈

勒索，逐户查缉，严刑逼供，任意株连，“不论习教不习教，但论给钱不给钱”，若不给钱，“即诬以邪教治罪”。成千上万的民户家破人亡，冤死者不计其数。疯狂的大屠杀，终于迫使广大农民走上武装起义道路。

乾隆六十年间，起义的酝酿和准备首先从湖北开始。湖北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地区之一，也是屠教的主要受害区，贪官酷吏处处皆是，加以江汉一带连年灾患不得救治，民怨沸腾。是年湖南、贵州等省苗民起义，清廷调集兵力南下征讨，湖北守备空虚，为准备起义提供了有利时机。此外，连接巴山、南山老林的鄂西一带，亦具有良好的地形条件。各地教徒利用偏僻山洞或假借“防苗”名义为掩护，打造刀枪器械，购制火药，勘察基地，聚集粮食，缝制号帽，加紧各项起义的准备工作。

湖北襄阳地区，当时是白莲教向本省及邻省发展的中枢。宋之清、齐林被害后，齐林的门徒姚之富继为襄阳教首，在他们领导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。襄阳的老师傅在各地同教中也有较高的威望，相互之间通过师承关系保持着松散的联络。乾隆末年，襄阳教首曾与本省各州县教首密约，于嘉庆元年三月十日（即所谓“辰年辰月辰日）发动起义。由于有些地方起义准备活动被官府发觉，派兵勇搜捕，被迫提前起义。

嘉庆元年即丙辰年元旦，乾隆刚刚御太和殿亲授宝玺传位于新皇帝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便在“官逼民反”的沉痛呼唤中爆发。

正月十日，荆州府枝江首先起义，张正谟、聂杰人等率众在洋郑畈拒捕而提前举事，各部起义军随即会合江家墙，共一万余人。

二月八日，荆门州当阳相继起义，杨起元、陈德本等领导在东湖宋家咀举事，随即攻占当阳城，大部起义军会合城内，共四、五千人。

二月十日，宜昌府长阳声援枝江起义，林之华、张训龙等率众在榔坪举事，随后谭加耀率部来会合，共一万数千人。

二月十五日，施南府来凤大举起义，杨子敖、胡正中、唐贵等率众在可峒小坳举事，攻取来凤城后与旗鼓寨田谷敦部会合，共达六、七万人。

二月中旬，郧阳府竹山、竹溪、房县、保康联合起义，吴名山、祈中耀、曾世兴、徐良等率众分头举事，攻占竹山、保康城，合围房县城，共一万数千人。

三月十日，襄阳府地区按预定计划起义，姚之富等拥齐林之妻王聪儿为总教师，率众在齐林家乡黄龙墙举事，参加会合者一万余人。

五月六日，汉阳府孝感坚持起义，孙在公、刘世俊等率众克服重重困难在文家大塘举事，随即会合于胡家砦，共五千余人。

此外尚有数十处规模较小的起义。参加起义群众总计十余万人。[6]湖北共辖十府一州，起义浪潮及于六府一州。

起义爆发后，清廷表面故作镇静，实际上极为震惊。一面传旨奖励绅衿富户扩大乡勇团练，“合力齐心，擒杀贼匪，设法防守，各保身家”[7]，利用汉族官僚、豪绅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，施展其一贯的“以汉制汉”策略。另一方面急命湖广总督毕沅、湖北巡抚惠龄、荆州将军成德、四川总督孙士毅、陕西巡抚秦承恩、西安将军恒瑞、陕甘总督宜绵、乌鲁木齐都统永保、头等侍卫舒亮、广州将军明亮、河南巡抚景安、直隶总督庆成、署两江总督苏凌阿等，陆续率各路清军前来镇压。清廷原以为“伙党不过乌合之众”，可一举扑灭，而起义烈火却骤然成燎原之势。

究竟什么原因，促使广大白莲教徒和无数农民举家亡命地投入这场血与火的搏斗呢？其根源和动因已昭然若揭。在起义之初，河南巡抚景安即向皇帝奏报：

> 湖北邪教本多，襄阳更甚，初起时候不过间有蠢动，原不敢齐心造反，因各处乡勇捉拿邪教，焚烧房屋，擅杀报功，凡有邪教见此情形，人人危惧，遂至激变，蔓延四出。”[8]

至于“反清复明”，是不是这次起义的目的和本质呢？就广大起义农民来说，“反清”是实，“复明”是虚。这个口号，当时对于揭露清廷“以汉制汉”策略，争取汉族人民支持义军反对清军，尚有一定作用。如襄阳义军张汉朝（清档案中因讳皆将“朝”改为“潮”，下同）属部在一张安民布告中便写道：“吾主本大明之脉绪，尔等皆大明之故民，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，扶老携幼何必远逃，各存通权达变之见。”[9]但从本质上说，所谓“复明”，乃指恢复以汉族地主阶级为统治基础的朱明王朝，这在当时已不符合历史潮流。自康熙平三

藩之乱和收复台湾，朱明后裔已被殄灭（所谓“牛八”嫡裔皆系伪托），作为恢复朱明王朝的阶级基础——汉族地主阶级抗清派已不复存在，相反的，满汉地主阶级正在联合镇压起义农民，更谈不上参加这次农民起义，何谈“复明”？

历史事实证明，这次白莲教农民起义，是一次苛政与重剥交逼下自发的农民大起义，其本质是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，是一次以汉族人民为主的抗清反霸运动。

二

由于整个起义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、战略方针及统一指导，加之农民的分散性和保守性，各地义军起事后大都聚集到预定的山寨里，主要忙于修筑防御工事，营建棚舍库房，打造兵器和运集粮食，准备长期固守。在清廷就地包围、各个击破、一网打尽的策略之下，战略上消极防御、毫无外应、孤守城寨的义军，都不出半年左右先后失败，被清军优势力量全部围歼。清王朝的歼灭性屠杀政策，并未能达到一举尽绝根株的目的。湖北六府一州的白莲教起义，虽然其中五府一州都遭到失败，但襄阳一府却异军特起，开辟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新局面。以王聪儿为总教师的襄阳义军，并没有因循孤守城寨的消极防御道路，而是一开始便走向主动灵活、相机进攻的积极防御道路，在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使清军陷于被动地位。嘉庆元年四月间，清廷便发现和认定襄阳义军是主要攻击对手。

多年来，襄阳地区作为传布白莲教的中枢，培养和聚集了一批农民领袖人才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襄阳义军的领导集体，他们联系群众，机智勇敢，顽强善战，重视兵略。总教师王聪儿，生于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 年），襄阳人氏，自幼流落江湖，随父习武卖艺，擅长骑射武功，小小年纪便已饱经风霜忧患，熟悉基层社会，性格侠义勇为，因嫁齐林为妻，教中尊称师娘，具有很高威望，领导起义时年仅十九岁。教首姚之富是齐林门徒，年岁较长(白莲教传徒不以年岁为限)，经验阅历丰富，有军师才能，是继齐林之后襄阳最有影响的教首，他在义军中始终辅佐王聪儿，运筹作战方策，加强相对统一的领导核心，是一位关键性人物。襄阳各支义军的首领李全（即李述）、王廷诏（即王大树）、张汉朝、刘起荣、高均德等，也都是有众望的教首和善于独立机动作战的领导人物。这是形成坚强的襄阳义军集团的重要保证。

襄阳义军摒弃孤守城寨的消极防御道路，并非忽视建立后方基地的重要。为了保障义军的生存，还在起义准备阶段，姚之富、姚文学父子便亲自到连接巴山、南山的房县、竹山、竹溪一带试图建立政权和基地。但由于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根深蒂固，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农民起义，不可能改变封建制度的社会基本结构而建立自己的政权。这次尝试未能实现，姚文学遭到杀害，起义军也主要被豪绅地主武装乡勇扑灭。所谓“天运”年号，是房县人张训龙到长阳支持他的徒弟谭加耀领导起义时宣布的，后来在张汉朝属部的那张义军安民布告中也揭示了“为天承运”的主旨，是现存的“天运”年号的惟一释义。这些都反映了襄阳义军对建立政权和基地的企求，当时不可能实现，而不得不在无后方的艰难条件下流动作战。

襄阳义军自嘉庆元年三月十日在黄龙垱起义后，各支义军分头集结，经过组建，随即展开举义攻势。三月二十九日首先攻占清廷南北交通线上湖北第一站吕堰驿，切断敌之文书往来。四月七日进取樊城，缴获大量武器物资。接着南渡汉水围攻襄阳府城，这里是清廷杀害大批白莲教首领并悬城示众的地方，王聪儿全身穿着白衣率队冲锋，守城清兵以炮火抗拒，义军同仇敌忾，“随倒随进”，英勇奋战，在予敌打击后撤回汉水北岸。刚刚起义的农民军，连克两重镇，敢于进攻府城，清廷大震，急调得力战将永保、恒瑞、庆成、明亮、舒亮、巴克坦布、阿尔萨朗等专往攻剿。襄阳义军从此扬威江汉，队伍迅速扩大。

面临清军进攻，襄阳义军从开始便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，使敌人苦于应付。河南巡抚景安四月十六日奏折中最早反映了这种情况：

> “双沟为贼匪屯聚之区，四分滋扰，出没无常，官兵东指，贼即西扰，其意不过依恃贼伙众多，使官兵疲于策应，窥探虚实，计图乘势侵袭。”⑩

在清军大举进攻之前，襄阳义军于五月十

一日主动放弃地形险要而不宜死守的双沟，在运动中与清军周旋。先后历经刘家集、张家集、梁家冈、张家壋、梓山、青潭等战斗，都在予敌打击后主动转移。但遇有利时机亦主动出击，如先后围攻官庄、枣阳，袭击香花园、郭家冲、高老集、胡家畈等清军营卡。这一系列初战，锻炼了年轻农民军的作战能力。

到了当年七月间，清军及乡勇逐渐云集汉水以北襄阳府地区（包括枣阳、宜城），义军在这块狭小地域运动作战日益困难。于是决定越出襄阳府界，甩开清军重兵，实行敌进我进，向南前出到安陆府钟祥县境，突袭长春店、土门冲、粮台等清军营寨，武昌（今武汉）震动。大批清军随即跟踪而至，将义军主力包围在钟祥山区，欲一举歼灭。王聪儿、姚之富识破敌之意图，立即决定跳出重围北上。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展开激战，义军乘夜分路突围，粉碎了敌之围剿。

当时清军严密控制着流经湖北境内的汉水中下游，义军不可能跨越汉水向南及西南机动，遂决定越出省界，向北及东北进入河南。于是襄阳义军分别转移到鄂豫边界的襄阳、枣阳、随州地区活动，王聪儿、姚之富部一路欲经吕堰驿进入河南邓州，另一路欲经枣阳进入河南唐县；还有王廷诏、李全、张汉朝等部在随州桐柏山、大洪山一带活动，欲越桐柏山进入河南信阳。清军则在湖北边境不停追剿，在河南边境各关口严密防堵，力阻义军入豫。当年九月以后，义军在两省边界进行了上薛家集、吴家集、草店、仓台、陈家河、叶家店等艰苦战斗，进一步实行分股活动，迷惑敌人，待机入豫。

以乌鲁木齐都统永保为总统的清军，在湖北围剿义军数月，战而无功。清廷甚为不满，乃于十二月十日寄谕查问永保等因循玩忽军务之罪，认为“贼匪并无巢穴，只是苟延残喘，而永保等统领多兵，不四面兜擒，仅事尾追，以致贼匪日聚日多，其罪实无可逭”，着令原湖北巡抚惠龄接替总统职务。按当年年初，永保曾奉召进京，亲聆皇上面授机宜，专赴湖北主持剿办“教匪”，如今成了第一个因剿办襄阳义军失利而被罢免的清军统帅。惠龄深知内里苦衷，在诚惶诚恐地接任总统之后，便在战况奏折中插上一段“贼情”介绍：

> “查楚、豫两省习教之犯处处皆有，只以畏惧官兵未敢出而从逆，一经贼匪逼胁招邀，千百成群，一呼而至。兼以地势平衍，道路分歧，无险可扼，贼人生长此地，凡有捷径小路，无不熟悉，往往官兵探明贼踪直前攻击，贼已风闻预从他处逃逸，不但兵力徒劳，且使迎剿之兵转成尾追之势。是襄阳一带与灌湾脑、凉山、黄柏山之聚于一处者情形迥不相同。”⑪

上面这一段话，实际上是对朝廷问罪永保的一个辩护，也是惠龄等为自己处境向朝廷的一番解说。然而，这段话的要害在于最后一句，即襄阳一带与灌湾脑等聚于一处者“情形迥不相同”。也就是说，那此聚守山寨者容易消灭，而对付飘逸不定的襄阳之“贼”实在不易。朝廷却仍然一再催促“务使贼匪聚于一处，痛加围剿”。

到了嘉庆二年二月间，各路襄阳义军都先后越过鄂豫边界进入河南。原活动于随州地区的王廷诏、李全部越桐柏山进入河南信阳，一路南进至罗山、光山县境，一路北上至确山之竹沟，旋即挺进西北舞阳、叶县、鲁山一带。王廷诏、李全皆河南人，是襄阳起义前率六千河南教众来会合的，此次回乡更是积极。王聪儿、姚之富部分路从襄阳各县境直接进入河南，活动到内乡、裕州（今方城）、南召、嵩县、卢氏一带。义军遍及黄河、洛河以南之豫西地区，一度威胁开封。清军被动地尾随而来，追逐于广阔的中原，在高度分散流动的情况下尚未及组织大的进攻，义军又很快离开了河南。

嘉庆二年三月下旬，襄阳义军便分三路从河南卢氏进入陕西之商南、雒南（今洛南）县境，并围攻商南城，清军又匆匆地追剿到陕西。王聪儿、姚之富率主力越伏牛山至陕西雒南，清军跟踪堵截，三月二十一日罗家湾战斗中，王聪儿左臂中箭落马，为左右救起。义军主力随即向西南镇安一带活动，五月一日王家坪战斗，义军突然袭击临时驻扎之清军精锐部队健锐营，杀护军统领阿尔萨朗以下一批将弁，并歼其一部，显示义军主力已具有坚强的野战攻击能力。五月四日又与清军激战于黄龙铺山口，再杀清军四将，军威益振。襄阳义军进入豫陕的几个月间，部队也由数千人增加到

两万余人，并决定南渡汉水前往川东与四川义军会合。

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和襄阳义军机动作战胜利的影响下，嘉庆元年九月四川东部地区达州（今达县）白莲教首领徐天德、王登廷于亭子铺率众起义，东乡（今宣汉）白莲教首领王三槐、冷天禄于峰城率众起义。随后两部在达州麻柳场会合，成为四川义军初期的主力。清军多次进剿，义军主动出击敌之营卡，乘势打击地主武装乡勇，并向新宁（今开江）、太平（今万源）地区发展，十月间即欲与湖北义军会合。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清军进攻横山子，义军五路反击，痛歼清兵勇，击毙都司、镇臣、守备、把总八名。义军几次围攻东乡城。巴州（今巴中)、通江、太平等地白莲教相继起义，势及川东、川东北四府一州，毗连大小巴山。四川义军也曾发展到数万人，在抗击清军围剿中逐渐减员。

襄阳义军为争取南渡汉水进入川东与四川义军会合，作了全盘部署。嘉庆二年四月间即以一部北向蓝田威胁西安，另一部西向汉阴威胁汉中。但实际上清军已经探知义军欲南渡汉水与四川义军会合的意图，并引起清廷重视，再三谕令严密封锁汉水，调兵沿江堵截，船只控制到南岸，务必阻止义军南渡入川。五月上旬，义军分路迅速进至汉水北岸之洵阳、安康（即兴安府治)、衡口等地，第一批义军于十二日从安康与紫阳间的白马石渡口，涉渡与船渡并用，顺利越过汉水，全无阻拦。

清军至十九日始发现义军南渡，惠龄等于二十日急向清廷奏报，先说十九日探知并即剿杀后渡贼匪，“击毙贼匪数百人，伏尸满岸”，后说“五月十二日贼匪由白马石抢船渡江属实”，语无伦次。清帝恼怒，五月三十日上谕指出：“贼匪于十二日偷渡，惠龄于十九日始到白马石，相距已有八日之久，贼匪陆续偷渡，岂有八日不能渡毕之理。”痛斥“是惠龄等胆大妄言，竟不知人世有羞耻之事，实非人类矣”。决定革去惠龄总统职务，由宜绵接任，明亮、德楞泰为帮办。这是清廷因追剿襄阳义军失利，第二次更换主帅。

五月中旬，襄阳义军即分三路越大巴山入川。分路经太平之城口和通江之竹峪关，进至东乡之南坝场、固军坝、官渡坝及开县清水之温汤井，沿途力避与清军接仗，然后都到东乡之前河（即前江）一带会合屯驻。六月二十三日，清军追剿四川义军徐天德部到半头山、白秀山一带，襄阳义军数股突然从山沟树木内出击，马步齐战，立解徐天德部之危。战后即屯驻土黄坝至五保顶一带，两大义军终于会师。当时徐天德部虽然只有千余人，襄阳义军约两万余人，但连营三十余里，声势益振。六月二十四日清军开始发起进攻，经数日激战，义军转移至开县，派千余人至温汤井为钳制，主力屯驻南天洞、火焰坝、白岩洞一带。

六月底驻扎南天洞的短短几天，是两大义军会师的重要时刻。王聪儿、姚之富与徐天德、王三槐及各路首领聚议，商定按青、黄、蓝、白分号，编为八支义军，各支义军分别设掌柜、元帅、先锋、总兵、千总等职，继续分头转战于川、鄂、陕、豫、甘五省。这次农民起义，经过一年半的苦战，已经开创了宏大的武装斗争局面，建立了几支有战斗力的农民军。然而，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，在会师的关键时刻，未能提出任何政治纲领或政治口号，仍停留于单纯的军事活动范围；也未能建立联合的军事统帅机构，制定统一的战略方针和协同作战计划。各路义军仍然循着老路各自为战。

六月二十七日清廷下达谕旨，再次强调集中力量围歼入川之襄阳义军。从闰六月一日开始，清军节次进攻南天洞一带襄阳义军，并在万县、云阳、夔州（今奉节）等地布防，准备堵截襄阳义军返回湖北。闰六月九日前后，襄阳义军除留李全部与四川义军配合行动外，以王廷诏部先跃进湖北牵制清军，王聪儿、姚之富亲率主力一万余人沿长江北岸东进，直趋万县、云阳、夔州。清军跟踪围追堵截，并在白帝城构筑阻击线，义军于闰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猛攻，激战两昼夜，突破阻击，越巫山进入湖北。当襄阳义军经过川东各县时，当地教徒和群众纷纷起义响应，每股少则两三千人，多则七、八千人，被称为新义军，四出攻城夺镇，声势浩大。清军分兵镇压，疲于应付。襄阳义军在群众抗清反霸的热潮中顺利通过危险的峡区。

嘉庆二年七月初，襄阳义军进至巴东、归州（今秭归）以后，即分兵活动。北路经兴山入南漳、房县，遍及汉水以南襄阳、郧阳各县境；东路至东湖（今宜昌)、当阳、远安、荆

门、钟祥等县境，威胁长江北岸及荆州（今江陵）。清军主力进剿东路，迫其北上与北路合归一处，企图逼入房县西南山区围歼。王聪儿、姚之富发现，在汉水与长江汇合的三角地带，清军云集，南北均为大江阻隔，对义军机动十分不利，决定经竹山、竹溪西去陕西，以图从陕西北渡汉水去河南。清军探知这一意图，遂在汉水及其支流陡河（即斗河）严密设防，力堵义军西去。于是展开频繁的战斗。八月十四日在白河县境石槽沟之关庙河山梁两军遭遇，发生激战，义军击毙满兵副都统丰伸布等四将。八月三十日在郧阳沿汉江之草甸遭遇，双方五路对阵，大规模交战，旋义军撤退，清军追击至长坪，义军突然猛烈反击，毙清将协领傅德、副都统防御五十七、惠纶等六员。此仗显示了襄阳义军顽强的战斗力。

草甸战后，襄阳义军突破清军陡河堵截线，于九月上旬至中旬，经竹溪陆续进入陕西白河、洵阳一带汉水南岸。同时，原留在四川的李全部，亦由太平、通江进入陕西西乡、石泉、紫阳一带汉水南岸。四个月前，襄阳义军为了与四川义军会合，曾经从这里南渡汉水；如今为了回到河南及豫鄂边境，又迫切需要从这里北渡汉水。清军立即加强陕西汉水江防，并跟踪追剿，先后进行了石香炉、狗脊关、马鞍铺山、蒋家坪等战斗。义军皆不恋战，略事交锋后退入西南山内，俟机北渡。

三

襄阳义军转战数省，由鄂而豫，由豫而陕，由陕而川，由川而鄂，现在又由鄂而陕，来去驰骋，影响甚大；尤其敢打野战、近战、恶战，屡次击毙清军悍将，战斗力日渐增强，清廷深虑。嘉庆二年十月十六日上谕，再次强调要集中力量围剿襄阳义军，作战方略是“宜合不宜分”、“并力剿尽一处，再办一处，以期一律肃清”和“速擒首逆”。当时的具体目标，便是将襄阳义军封锁在汉水以南川陕边境，一网剿尽。

清军主将明亮等，因五月间惠龄放任义军南渡汉水而被痛斥革职，故对江防特别提心吊胆，严密守备，实际上把阻止义军渡江放在首位。义军几次从中游偷渡、强渡皆未成功，乃于十月下旬转移到上游汉中、沔县、宁羌（今宁强）一带，欲利用汉水发源地冬季浅涸，易于趟渡。不料清军迅即加强上游江防，几次偷渡、强渡仍未成功。

十一月间，清军在汉中地区追剿起义军，进行了唐家坝、罗村坝、二郎坝等战斗。每次交战，义军总是向南面山内逸去，企图将清军诱入深山，以便寻机北渡汉水；而清军亦怕中计不敢入山穷追，及时回顾江防，以禁绝义军北渡为重。战局处于胶着状态，持续下去双方也都有困难。对清军来说，即使堵住了义军渡江，但久而不能剿灭义军，也无法向皇上交代。对义军来说，虽然清军不敢入山 远追而比较安逸，但不能渡江机动，两万多人久聚地瘠人稀的贫困山区难以解决吃粮问题。

王聪儿、姚之富遂于十一月底改变策略，表面上放弃北渡汉水计划，全军大举南下四川。襄阳义军分数路越过米仓山，直趋川北通江、南江、广元各县境，进抵保宁（今阆中）之苍溪等地，兵临嘉陵江畔，势将阑入栈道，欲与冉文俦会师。清军惊异，立即跟踪入川，分头追剿，十分被动，深感“各首逆中齐王氏最为狡诈”。情况既变，清廷也随之决定在川北就地围歼襄阳义军。

正当鏖战川北的时候，襄阳义军高均德部数千人，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从陕西南郑家坪(距汉中城二十里）涉浅北渡汉水，无人阻拦。当时府城空虚，高均德未予置理，向东北经洋县、毛坪、五郎逸去。二十七日清主将明亮、德楞泰闻讯，惊惶失措，认为“追击高均德一股尤为紧要”，立即亲率大部清军赴陕西追击高均德部。清廷接到奏折，殊为惊诧，于嘉庆三年正月初八、初九连续两道上谕，指责明亮等“舍姚之富、齐王氏等大股贼匪，轧带全队劲兵由沔县、褒城驰抵汉中追高均德……实属大错”，“正堕贼计”，“即系畜类，亦不应糊涂昏愦至于此极”，着令“所有明亮、德楞泰前得之世职及优赏紫缰俱著概行革去，只留本任职衔，俾其戴罪图功”[12]。这是清廷因剿办襄阳义军失误，第三次降罪主帅。

高均德北渡汉水，明亮跟踪追击，使川陕战局又为之一变。清军为力阻高均德部东进河南，在陕西汉水以北的兴安、商州等地区不断堵截，高均德以襄阳义军之一部对抗清军主力，经西川、东川、太白庙、三官庙、欧家川、罗家河等频繁激战，毙敌将多员，自己也

付出较大代价。由于高均德部吸引和牵制了清军主力，襄阳义军各部得以从四川回到陕西，先后北渡汉水。

嘉庆三年正月底至二月初，王聪儿、姚之富率主力从石泉以西陆续北渡汉水，歼击大批沿江堵截的清军与乡勇。二月四日柳林铺之战抄袭清军兵营，毙其把总、外委、武举等八员。北渡之后，即在汉阴地区与高均德部会合，至洵阳与镇安间之两河关一带机动。二月十八日在洵阳判官岭设伏，袭击前来进剿之清军，毙其佐领噶三保等三员。义军时分时合，寻机突破堵截，欲从商州或郧西地区前往河南。

二月四日，李全率部从城固附近涉渡汉水，北上留坝、铁冶河等地，十日进攻桅杆、石梁卡清军后，逸入佛爷坪老林。旋越过秦岭，十七日至宝鸡之虢川和岐山之桃川，距郿县（今眉县）城一百余里，由此可入通往西安、潼关大道，威胁省城。李全的行动，是襄阳义军此次东进河南作战的重要配合。

近两年来，襄阳义军迭次主动转移战场，清军以骁将重兵堵截全告失败，清廷深感清军之无能。现在襄阳义军又要由陕西到河南去，清廷乃严加监督，惩戒主将，痛斥清军种种积弊，企求振作军队，“速擒首逆，尽剿贼匪”。

嘉庆三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清帝再次下达谕旨，命宜绵带兵驰往陕西接办明亮等一路统领事宜，特别指出：“若明亮能于宜绵未到之先将高均德、齐王氏、李全等拿获，尚可稍赎重罪，如宜绵一经接代，即当遵旨将明亮革职解京治罪。”这实际上是逼令明亮等限期包歼襄阳义军，包擒义军首领。同时痛斥清军积弊，谕曰：

> “再闻从前军营积弊指不胜屈，或官兵追剿之时，间有将贼匪擒获者，类皆老幼残弱之人，而真贼百不获一；兵勇打仗阵亡者则以多报少，而杀贼之数则以少报多；或贼未来而先放枪炮，以冀其远遁，若贼势逼近则移营后退，以避其锋。且闻贼登山越岭往来便捷，而官兵转畏崎岖，贼匪测探水浅处所即呼群而渡，而官兵必待舟梁始过；贼匪日窜百余里，而官兵日行只四、五十里。前此带兵大员皆中此弊，以致首逆远扬，胁从日众。”⑬

把所谓“胁从日众”归咎于上述清军积弊，当然是混淆视听。但此时此刻将清军中的部分积弊摊牌，则抓住了要害。于是，自德楞泰、明亮以下官兵，不敢不更加竭力为朝廷奔波卖命。在渭水与汉水之间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，又一次展开了殊死的大搏斗。

嘉庆三年二月中旬，清军主要云集于陕西商州地区，包括商县（州治）、雒南、商南、山阳、镇安及邻近各县境，将通往东北方向而可以进入河南的大小道路，概予查勘和控制；并在湖北郧西县境调集大批乡勇，网罗密布，遍堵由郧西前往河南的通途。同时，清军主力不停地追剿、抄截，力图将襄阳义军逼入背临汉水的西南山区，一举剿尽。

王聪儿、姚之富、高均德深知敌之图谋，一再突破清军由东北向西南的兜逐，力求转往东北入豫。二月十八日判官岭之战，清军从东北压过来，义军被迫暂时折向西南，经烂草坪、庙沟等地绕道至野竹坪，可直趋东北，不料清军已抄前堵截。二月二十一日野竹坪激战后，义军被迫再向西南转移，欲从旧县关之纸房沟绕道商州、山阳间前去东北，不料又被清军抄前堵截。于是在旧县关一带分两路突围。王聪儿一路进至商州城附近九间房，清军设伏，义军顽强抗击，毙清佐领胡世讷，然后向西北入蓝田县境。高均德一路进至山阳峒峪河、下关坊，与追剿清军激战，毙清佐领噶塔宝、章果保二员，又进行上关坊战斗，然后经犀牛槽北入蓝田县境，欲与王聪儿部会合，为清军所阻。

与此同时，李全、张天文部于二月二十一日由虢川、桃川至郿县斜谷关，攻克卡隘进入平原地带，经齐家镇，一路直扑郿县城，一路沿渭水东进。二月二十二、三日进入盩厔（今周至）之槐芽镇、亚柏镇，旋越过县城，二十五日到达南山脚下之焦家镇（即焦家巷），距西安城五十余里。清总兵王文雄部以优势炮火坚守焦家镇，激战至天黑，义军退入西南山内。清军入山追剿，二十六日战于焦家镇附近的圪子村，二十八日战于鄠县（今户县）南之集贤地方，三月一日战于长安县之尹家卫，然后义军经大峪口至汤浴口入蓝田县境，分散活动于库峪、翔峪、沣峪一带。时李全、张天文拟与王聪儿、姚之富会合，适清军额勒登保部

为抄截王聪儿部进至库峪一带，亦进击李全部，堵绝了会合意图。

三月初，襄阳义军王聪儿、高均德、李全三路虽然皆入蓝田，未能实现会合，清军继续分头追剿。此时李全、张天文一路势欲东进，清军恐其经雒南一带入豫，留额勒登保部专事堵剿，从而牵制了清军一部分主力。德楞泰部继续由北向南逼剿，高均德一路遂折回山阳南去，王聪儿、姚之富一路则经山阳东去。德楞泰若分兵追剿，兵力势必单薄，乃决定放弃高均德一路，集中力量追剿东去之王聪儿部，防其经漫川关、高坝店入豫，并图擒拿“首逆”。而该地又是乡勇密布之区，王聪儿部遂处于险恶境地。

三月五日，王聪儿部从宽坪向莲花池转移，清军追至，三路进攻，两军短兵相接，经剧烈搏战，义军分两路突进至两河口、漫川关。清军又跟踪三面夹击漫川关，义军英勇攻战，未能突破堵截前去东北，被迫折向西南甘沟。三月六日，清军由鄂陕边之上津堡、槐树沟一带继续向西南兜剿，义军转移至三岔河，正据守山梁和沟口抗击清军，准备突进摆脱清军，适湖北把总修永宏带领乡勇赶来堵住去路。德楞泰讯知王聪儿、姚之富均在左山梁内，立即调兵重重包围。义军在卸花坡上顽强抗击，直至弹尽矢绝，仍以山上滚石还击，大部战死，也予敌重大杀伤。直至最后，王聪儿登上山顶，投崖壮烈牺牲，时年二十一岁，随从女亲兵十余人相继跃下，姚之富亦毅然坠崖。

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五省农民战争，是当时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。以王聪儿、姚之富为首的襄阳义军，是促进五省农民战争的核心和主力军。嘉庆三年三月八日清军主将德楞泰奏折称：“楚匪滋事以来，蔓延数省，皆由齐王氏、姚之富二犯朋比为奸，首先集众焚劫，同教匪犯妄称该犯为总教师，到处蜂起附和，听其号令，是该二犯尤为众恶渠魁。”这段话从反面说明了王聪儿、姚之富及襄阳义军的巨大影响，也透露了清王朝的尴尬和畏惧。

襄阳义军主力的覆没，使跨越数省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失去了最坚强的骨干力量，但远远不是战争的结束。在德楞泰奏折中断言“此股贼匪为从逆之魁，既经剿尽，别股贼匪闻风震慑，自必亡魂丧胆，逐渐解散。”事实并非如此。就在三岔河之役失利时，其他各路襄阳义军发出为王聪儿复仇的愤怒口号，依然积极地与清军搏战。此后，襄阳、四川及五省的大小数十支义军，长期继续坚持战斗，且时有发展，前后达七年之久，直至嘉庆九年九月最后终结。

---

①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四九七。
②严如熤《三省边防备览》卷十四，艺文下《兴安升府疏》。
③同上，卷十一，策略第19页。
④同上，卷十四，艺文下第3页。
⑤《勒保奏审明刘松等倡教传徒情形折》（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六日）。
⑥湖北各地白莲教起义时间、地点、首领、人数，均根据清档案各有关奏折、战报、供词核对辑录.
⑦《嘉庆元年三月初三日上谕》（剿捕档）。载《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》第五册，第171—174页。
⑧《景安奏询知襄阳邪教情形折》（嘉庆元年四月二日）。
⑨《白莲教农民起义军布告（之一）》。载《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》第五册，第1页。
⑩《景安奏询知襄阳邪教情形折》（嘉庆元年四月十六日）。
⑪《惠龄奏折》（嘉庆二年正月十七日）。
⑫《嘉庆三年正月初八日上谕》（剿捕档）。载《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》第五册第480—486页。
⑬《嘉庆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上谕》（剿捕档）。载《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》第五册第496—498页。

（作者奚原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军事百科编审委员会副主任；邮编100091）